

呼唤“学问”底下的“温情”“诗意”与“想象力”

陳平原

十多年前，我撰《大学校园里的“文学”》（收入《大学有精神》（修订版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6），其中第一节“曾经，‘文学’就是‘教育’”，用了两个有趣的例子。一是建安八年（公元203年），曹操颁《修学令》：“丧乱以来，十有五年，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，吾甚伤之。其令郡国各修文学，县满五百户置校官，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。庶几先王之道不废，而有以益于天下。”这里说的“各修文学”，当然是指教育——设校官，选才俊，认真培育，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，“先王之道不废”。一是日本人森有礼编纂、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翻译的《文学兴国策》，在晚清影响极大，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、创建新学体制的重要样板之一。

书中第一篇，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复函，论述“文学”如何有益于富国，有益于商务，有益于农务、制造，有益于伦理、德行、身家，有益于法律、国政等，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“文学”，也是广义的文化教育，而不是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。

当然，古代中国关于“文学”的界说，主要是不教育，而是“文章博学”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说到孔门四科，分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这里的“文学”，不是文学创作，而是人文修养。《论语·季氏篇》所说的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不仅是训练表达能力，更包含思想、趣味、思维、情感、学识等。学《诗》的范围及功能涵盖整个人文学，反过来，“六经”中其他科目的训练也包含了若干今人所理解的“文学”。正因为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，“文学”无所不在，每个人都得苦心钻研，反而不必设立专门学校。

进入现代社会，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；“文学”作为一个“学科”，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。最直接的表现是，建立文学院系、开设文学系列课程、讲授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、授予文学学士/硕士/博士学位；与此相对应的是，中学毕业以后，绝大部分读书人不再亲

近文学了。所有这些，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，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。文学依旧有其独立价值，但重要性明显下降；若以大学为例，那只是众多领域中的一个。

所谓“文学教育”，既指大学里的文学类课程，也包含中小学的语文课堂；二者教学宗旨及讲授方式不尽相同，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相对于此前刊行的兼及学问体系、学术潮流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的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；增订版，2016），本书虽仍以大学为主，但兼及中小学，更重要的是，将历史溯源、文化批评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。宗旨是追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，结构上则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；至于十专题的设置，蕴涵着我对“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”的整体想象以及自我限定了。

以“人文视野”开篇，到“读书方法”收尾，如此编排，是希望将“文学教育”从技术层面拯救出来，放置在更为开阔的视野。说到底，人文学的精髓在阅读，读有字书，也读无字书；读古人，也读今人；读中国，也读外国——这点大学与中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为何开门见山，强调“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”？那是因为“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，而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”，身处其中，不能不是自怨自艾，要学会“如何向圈外人发言，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”。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“文学教育”当然肩负同样的职责——这其实是全书得以展开的前提。至于谈论读书，为了与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（中华书局，2015）相趋避，这里更强调“自家体会”的重要性。去年年底编辑此书时，竟鬼使神差地选入2003年非典期间所撰《生于忧患》一文。年初新冠疫情暴发，我所接触的研究生普遍激愤、惶惑乃至惊恐，有感于此，在师生的微信群里贴出此17年前的旧文，希望大家调整心态：“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，尽快平静心情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）。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，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，不断激动、惶恐与埋怨，等到事情过去了，发现自己一事无成。”当时绝对想



陈平原

象不到，疫情会持续如此之久，影响如此之大。反过来，证明文中这段话依旧有效：“不一定亲历苦难，通过有效的阅读，触摸历史，体味人世的艰难，养成慈悲情怀，以及‘胜不骄败不馁’的平常心，同样十分重要。”

谈论现代大学的命运，我主张带入“学科文化”的视野，那样方才有比较通达的见解。本书的视野及根基是人文学——再具体点，那就是“中文教育台面上日渐萎缩”，身处其中，不能不是自怨自艾，要学会“如何向圈外人发言，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”。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“文学教育”当然肩负同样的职责——这其实是全书得以展开的前提。至于谈论读书，为了与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》（中华书局，2015）相趋避，这里更强调“自家体会”的重要性。去年年底编辑此书时，竟鬼使神差地选入2003年非典期间所撰《生于忧患》一文。年初新冠疫情暴发，我所接触的研究生普遍激愤、惶惑乃至惊恐，有感于此，在师生的微信群里贴出此17年前的旧文，希望大家调整心态：“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，尽快平静心情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）。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，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，不断激动、惶恐与埋怨，等到事情过去了，发现自己一事无成。”当时绝对想

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，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。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。中文系的基本训练，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，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，逸兴遄飞。有人问我，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？我说：“聪明、博雅、视野开阔，能读书，有修养，善表达，这还不够吗？当然，念博士，走专家之路，那是另一回事。”基于此理念，你就明白我为何主张“诗歌乃大学之精魂”。

谈论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，必须落实到课程设置，否则很容易陷入空谈。20多年前我在香港会议发言，题为《“文学史”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》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“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，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，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‘文学史’建设。”日后的很多论述，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。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，我谈论文学史，更多从教育体制入手，这也算是别有幽怀。作为一名文学教授，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，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“学问”底下的“温情”“诗意”与“想象力”，在我看来，既是历史研究，也是现实诉求。有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等专业著作垫底，我辨析各种“文学课程”，目的是将学术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。至于重点落在“现代文学”与“通俗文学”，而不是“外国文学”

或“古典文学”，主要是自家视野及能力限制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授，我至今仍坚持前年北京会议上的感叹：“曾经，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‘社会关怀、思想批判、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’的，是各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。可最近10年，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，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很可惜的——这里的可惜，既指向我们自身，也指向整个学界。”

最能体现我社会关怀及介入意识的，是“乡土教材”“民族文学”“语文教学”这三辑文章。比较得意的是“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”，因其既体现史学功夫，也落实为社会实践——合作主编《潮汕文化读本》，是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家乡做的一件实事。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，那不是我的主攻方向，更多的是体现“学者的人间情怀”。几次努力，都不太成功，但2014年上海会议上的主旨演说《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》却传播极广，效果出乎意料的好。三辑文章中，最具创见的，其实是在综合大学开设“少数民族文学课程”并编写相关读本的设想。不仅写文章公开呼吁，还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上书，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；虽然教育部在具体落实时遇到障碍，暂时搁置了，但我相信此创意总有一天会实现：编一册这样的读本，让其进入大学校园，促使汉族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文学（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、宗教意识、生活习俗等），养成开阔的视野、宽广的心胸、多元的趣味，不仅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，更可促成中国“多民族文学”的健康成长。”读书人讲究“坐而言，起而行”，且一万元太久，最好能剑及履及。因主观客观各方面条件的限制，我的很多教育、出版及文化革新计划都失败了，好在屡败屡战，“白说也要说”。

本书描述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，以我在中国大学出版社刊行的“大学五书”及“学术史三部曲”为根基，力图将学院的知识考辨与社会的文化批评相勾连，在教育制度、人文养成、文学

批评、学术思想的交汇处，确立“文学教育”的宗旨、功能及发展方向。略感遗憾的是，此书并非结构完整的专著，而是若干文章结集，其内在逻辑属于事后追认。不想为显示体系化而强行归并，保持文章的原始面貌且注明出处，目的是呈现其与学术界及教育界对话的状态。

作为中文系教授，关注“文学史”与“学术史”夹缝中的“文学教育”乃天经地义。从2002年《文汇报》上发表短文《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》，到2010年在香港撰写专论《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——关于“文学课堂”的追怀、重构与阐释》，再到2012年应台湾著名作家郭枫邀请，参与他主编“世界华文作家精选集丛书”第二辑，出版论文集《“文学”如何“教育”》（从北大版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中截取三章，外加五则短文），对我此题情有独钟。这回题目略有变更，且加了副题“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”，以便与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的副题“文学教育的方法、途径及境界”相映成趣。

最后说一句，2016年我曾在东方出版社刊行《六说文学教育》，这回鸟枪换炮，同样是受责编姚恋女士的鼓励，特此致谢。

（本文为《文学如何教育——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》自序）

作者简介：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（2008—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）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“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（1991）；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1995, 1998, 2003, 2009, 2013），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（2016）、第四届思勉原创奖（2017）、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（2019）等。先后出版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《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》等著作三十多种。

长风万里

（上接14版）这一年，高适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，是有名有实的封疆大吏；杜甫则从成都移居梓州，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后欣喜若狂，写下生平第一快诗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。

无论人间值得与不值得，李白在之前一年已经辞别人间。

作为诗人，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首诗是《临路歌》：

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

余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挂左袂。

后人得之传此，仲尼亡兮谁为出涕？

到底是什么疾病终结了李白的肉体生命，历史语焉不详，大多是“以疾卒”“以病终”之类的只言片语。晚唐诗人皮日休则明白无误地说李白“竟遭腐胁疾，醉魄归八极”。什么是“腐胁疾”呢？对此，我以为郭沫若的推测比较有道理：“腐胁疾，顾名思义，当是慢性脓胸穿孔。脓胸症的病因有种种，酒精中毒也是其中之一。李白在上元二年的发病，估计是急性脓胸症。病了，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，便成为慢性。于是，肺部与胸腔之间的蓄脓，向体外腐蚀穿孔。这可能就是所谓‘腐胁疾’了。”

令人叹惜的是，李白似乎对他死于酒精中毒的命运有所预感。他晚年经常到一个姓纪的老者那里买酒，纪老者几十年来都靠酿酒为生，李白为他的酒倾倒，两人成了朋友。后来，纪老者辞世，李白于761年写了题为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的诗：

纪叟黄泉里，还应酿老春。

夜台无李白，沽酒与何人？

夜台没有李白这样的酒中知音，纪老者你酿出的美酒又卖谁呢？一语成谶，很快，李白就循着那缕酒香追寻纪老者去了。

一辈子厌恶平庸的李白终于在平庸中死去——除了他不朽的诗文。偏偏，在他生前，他并未太把这些诗文当成一回事，至多只是叩开官场的敲门砖。偏偏，在他身后，却是这些诗文让

他永垂不朽。

在一些民间传说里，李白的死要浪漫得多。人们说他乘着酒兴跃身到江中捞月亮，月亮没捞着，诗人骑着鲸鱼成仙而去——这个故事说明，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热爱的人在天地间得到永生。殊不知，正如梵高说的那样：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，死去的人也活着。对于李白，我们也不妨下一定论：只要人类还存在，只要汉语还存在，他就永生。

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”这是我们祖先曾经困惑不已的问题，对短暂的肉体生命而言，或许精神世界可以长久，至少可以存留得更久。

所有的人都得死，只有在死亡面前，人类才真正平等。唯有因为死亡，生命才变得珍贵且富于意义。

李白并不是一个畏惧死亡的人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，这原本是中国大儒们追求的崇高而淡泊的境界，李白亦然。唐朝是一个诗人遍地的时代，也是一个诗人非正常死亡比较多的时代——比如王勃因渡海溺水惊吓而死，卢照邻不堪疾病折磨投水而死，李贺穷青春之精力作诗呕血而死。与之相比，李白的死要平静得多。人类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，李白能活一个甲子以上，算得上善终了。

因此细探寻李白到底病死还是醉死，抑或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溺死，意义都不大。我感兴趣的是李白墓地。李白墓地竟然有三处之多。

第一处墓地在长江采石矶边。宋人赵令畤的《侯鲭录》载：“太白坟，在太平洲采石镇民家菜圃中，游人亦多留诗。”南宋程大昌的《演繁露》也说：“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间有墓，世传为李白葬所。累甓围之，其坟略可高三尺许。前有小祠堂，甚草草，中绘白像，布袍，裹软脚幞头。”

不过，采石矶边的这座墓，乃是李白衣冠冢。它呼应的正是李白在江上捉月而死的民间传说。今天，衣冠冢被圈入采石公园范围。圆形的坟前，一块汉白玉石碑上，是林散之书写的“唐诗人李白衣冠冢”。



安徽当涂县青山南麓的李白墓地。这里当涂县政府按原样重新修建了一新的墓。（1983年摄）新华社资料片

徽当涂东南12里，因山势蜿蜒若龙而得名。范传正的《李公新墓碑序》称，他任宣、歙、池等州观察使时曾访得李白的两个孙女，她们告诉他：“先祖志在青山，遗言宅兆，顷属多故，殡于龙山东麓，地近而非本意。”李白生前因喜欢青山的风景而希望葬在青山，但由于“顷属多故”——多半是经济原因——又不得不暂葬龙山。

和采石矶一样，龙山同样是一个曾经的风流雅聚之地。东晋时，名士、大司马桓温曾与手下官员们于九月九日在此宴集，在座的有参军孟嘉。孟嘉酒喝多了，帽子被吹到地上也不知道，桓温令人把帽子悄悄藏起来，然后叫孙盛作文嘲之。孟嘉即席以文作答，挥毫立就而文辞优美，四座为之嗟叹，孟嘉也就成了一个著名典故。

这些先人的风流故事，李白当然

烂熟于胸。他甚至也像距他几百年前的桓温一样和朋友在龙山聚饮，并有《九日龙山饮》为证：

九日龙山饮，黄花笑逐臣。

醉看风落帽，舞爱月留人。

第三处墓地在青山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当涂李白墓园。青山又名青林山，在当涂县东南30里。李白葬于龙山55年后，他昔年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被任命为管辖宣城等地的地方官，此人和李诗爱好者，当涂县令诸葛纵一道，将李白改葬青山。新坟“西去旧坟六里，南抵驿路三百步，北倚谢公山，即青山也”。至此，李白的遗愿成为现实。

青山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山之一。此山左带青山河，右与龙山遥遥相对，峰峦翠碧，林壑优美。谢朓任宣城太守时，曾在青山上修建别墅，与人把盏言欢，故得名谢公山。谢朓死后，人们将其别墅改建为祠。谢朓祠与李白墓相距仅十几里。

多少年来，人类总是追寻生命的意义。所谓生命的意义，按我的理解，就是人类用来抵抗虚无的力量。于李白，他所设想过生命的意义也许是出将入相，建功立业；最终，命运女神赐予他的却是诗歌，是那些闪烁性灵之光的文字。借助不朽的文字，李白抵抗了虚无，他的生命有了掷地有声的重量。

古人曾说，世间最令人叹息的事莫过于英雄末路，美人迟暮。其实还得加上另一条，那就是祖先声名显赫，后代却泯如常人。

宋朝诗人曾巩也是李白的粉丝，他拜谒了李白墓园后由衷地感叹诗人身后寂寞凄清：“曾无近属持门户，空有乡人拂几筵”——曾巩陈述了一个在古人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：李白没有后嗣。

如前所述，李白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正室许氏所生的伯禽，一个是同居女子鲁妇所生的颓黎。关于颓黎，除了这个奇怪的名字，再没别的记载。至于伯禽，其平淡的一生，与任何一位乡间老农没多大区别。

元和十二年（公元817年），范传正到龙山为李白扫墓，眼前一派凄凉。仅仅半个世纪的光阴，李白坟上早已杂树丛生，乡人在这里打柴割草，放牛牧羊。范传正一面派人为李白扫墓设供，一面四处寻访他的孙女，也就是伯禽的两个女儿。

直到四年后，才终于找到了这两个没留下名字的李白后人，此时两人皆出嫁，一个嫁给陈云，一个嫁给刘劝，都是普通农民。范传正把她们请来相见时，她们“衣服村落，形容朴野”，但“进退雅驯，应对详沛”，还隐约留有书香门第的残余。

李白的两个孙女为范传正讲述了她们的凄苦身世：“父伯禽，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。有兄一人，出游一十二年，不知所在。父存无官，父歿为民，有兄不相保，为天下之穷人。无桑以自蚕，非不知机杼；无田以自力，非不知稼穡。况妇人不任布裙，粝食何所仰给，丽于农夫，救死而已。久不敢闻于县官，惧辱祖考，乡间逼迫，忍耻来告。”

祖父一世英名，却不能给子孙一点余荫。而父亲老死乡间，兄长离家出走，这两个可怜的弱女子只得嫁给目不识丁的农民为妻，以求混得一碗饭吃，苟全性命于荒诞人间。李白泉下有知，该会是怎样的伤痛和无奈？

范传正劝李白的两个孙女改嫁，他可以出面为他们找更好的人家——没有程朱理学束缚的唐代，妇女改嫁是很普通的事。但她们婉言谢绝了：“夫妻之道，命也，亦分也。在孤穷，既失身于下俚；仗威力，乃求援于他门。生纵偷安，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？”

当李白的两个孙女于840年左右相继去世后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李白的亲人了。代表李白留在世上的，是他那几卷雄奇的诗文，它们是另一种无言的存在，提示我们：在唐代，在中国，有一个诗人，他的名字叫李白，他曾有过这样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……